

贵州的文化守护与文明对话

吴志良



每次踏入贵州，总有不同的感受如清泉般涌上心头。群山依旧，村寨如昔，但每一次凝视，都能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发现新的灵光。那些散落在千山万壑间的文化遗产，如同被时光串起的珍珠，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在雷山县的苗寨，我遇见了一位80岁高龄的银匠。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正握着祖传的工具，一锤一锤地敲打银片，花纹逐渐浮现，那是迁徙路上的一条条河流，一座座山川。“这朵花是我们的祖先渡过黄河时见到的浪花。”他指着银饰上的纹样说，“这片叶子是他们翻越武陵山时采摘的茶叶。”在他眼中，银器不只是装饰，更是一部用金属书写的民族史诗。这样的文化记忆，正是民族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保护：从认识到行动的文化自觉

文化遗产历经天灾人祸和久远年代的洗礼，能够幸存至今的，都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保护这笔财富，守住民族的根与魂，是我们每一代人不可推卸的神圣责任。

在黔东南的侗族村寨，我目睹了一场“救火”行动——不是扑灭火焰，而是抢救即将消逝的侗族大歌。当地的文化工作者翻山越岭，寻访歌师，用现代设备记录那些即将随老人离去而消失的古歌。一位年轻的文保工作者告诉我：“每录下一首古歌，就像从时间的手中抢回一颗珍珠。”

保护文化遗产，首先需要的是文化自觉。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对文物保护的意识都有了极大提高。在镇远古城，我看到了这种自觉生根发芽。当地的居民不再将老建筑视为落后的象征，而是自豪地向游客介绍自家百年老屋的历史与故事。“这是我曾祖父建的，那时的木匠不用一根铁钉就能让房子屹立百年。”一位店主指着自家榫卯结构的房屋如是说，眼中闪烁着光芒。

法律与制度的完善是保护的基石。这些年来，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和制度构建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体系已相对完整。从汇报会的信息可以看出，各个政府部门都已担负起相关责任。不过，如同精密的机器需要润滑剂，这个体系或许还需要协调、协作，让保护工作运转得更加顺畅有效。

资源与人才的保障是保护的生命线。在偏远地区，资源和人才的匮乏是普遍存在的难题。我们不能完全依赖政府来完成这一宏大使命，必须调动社会力量，特别是企业的积极性，共同参与这项事业。曾经的教训警示我们，地方文化遗产保护人员和机构的存在不可或缺——因为对文物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本地人最为强烈。

令人欣慰的是，贵州扩大了文保所的编制，从十几人增加到90多人，并计划在贵州大学开办文化遗产专业。这一举措如同在文化的土壤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假以时日，必将长成参天大树。

传承：变与不变中的文化智慧

贵州是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典范。在这里，文化不是博物馆中静止的标本，而是村寨里生生不息的日常。

在黔南的一个布依族寨子，我见到了令人动容的一幕：孩子们放学后，不是立即回家看电视或玩手机，而是聚集在寨老的竹楼下，学习传统的布依族山歌。那些稚嫩的嗓音唱着千年前的旋律，仿佛古今在这一刻交汇。这种代际之间的文化传递，比任何物质遗产都更加珍贵。

然而，在传承的路上，我们需要提高警惕，不能舍本逐末，仅仅从旅游或经济角度考量，而要回归文化遗产保护的初心与使命。在西江千户苗寨，我看到了商业与传承的微妙平衡。一位苗家阿妈一边织布一边告诉我：“现在有些姑娘为了方便，都买现成的机织布做衣服，可我觉得手织的才有我们苗家的魂。”

更为关键的是，要在社会群体特别是青少年中，形成和强化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建议在教育系统中加入文化遗产保护的元素或课程，在历史课程中融入本地文化内容并进行讲解。在贵阳的一所中学，我看到历史老师带着学生们走访附近的古镇，让他们亲手触摸历史遗迹。“当学生们站在600年的古桥上，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就不仅仅是课本上的文字了。”这位老师的话道出了体验式教育的真谛。

文化遗产的传承，核心在于“活”。它既要保留传统的精髓，又要适应现代的生活。在六盘水的一个彝族村寨，我惊喜地发现，年轻人开始用短视频记录父辈的传统技艺，用直播展示彝族的火把节。古老的文化以新的形式延续着生命，这正是活态传承的精妙之处。

传播：从贵州走向世界的文化对话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以及文旅融合的深入推进，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影响力与日俱增。各地为了发展特色旅游，都在深入挖掘本土特色文化，并通过各种现代手段进行传播。

贵州作为中华文化基因的活态博物馆

之一，应当有更高的理想和抱负，加强对外传播。在毕节的彝族聚居区，我遇到了一位来自法国的文化学者，他专程来研究彝族的十月太阳历。“这是一种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时间观念。”他激动地说，“它体现了人类对自然规律的另一类理解，值得全世界了解和学习。”

提高对外传播的效果，关键在于用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和听得懂的语言，要与国际通用的表达方式和共同关注的话题接轨。当前全球传播领域最关心的是少数族裔和环境保护，即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这就是贵州的强项。

贵州是中国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各民族长期和谐共处，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同时，贵州曾经是欠发达地区，却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森林覆盖率逐年提高，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这些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

在黔西南的瑶族村寨，我目睹了传统文化与生态保护的完美融合。瑶族同胞世代传承的“砍一种十”习俗，保证了森林的永续利用；他们建造的吊脚楼，几乎不破坏地表植被；他们的稻田养鱼系统，形成自给自足的生态循环。这种生存智慧，对于面临生态危机的人类社会具有重要启示。

我一直认为，贵州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活样本。我们可以设想，通过数字技术建立“云上贵州文化遗产”平台，让全球观众随时随地欣赏侗族大歌的韵律；通过国际合作项目，邀请各国学者深入贵州村寨，共同研究多民族共生智慧；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将苗绣、银饰、蜡染等传统工艺带入国际时尚舞台。

在遵义的一个文创园区，我看到了这种文化对话的萌芽。当地设计师将苗族图腾与现代服饰相结合，创作出既传统又时尚的作品，远销巴黎、米兰等国际都市。“每一件衣服都带着我们贵州的故事走向世界。”一位年轻设计师骄傲地说，“文化只有对话，才能生生不息。”

结语：守护文明的灯火

夜幕降临时，我站在贵阳的甲秀楼上眺望，城市灯火与远山暮色交融。这景象令我想到，文化遗产就如同这灯火，在时间的黑夜中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传播，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它需要保护的坚韧、传承的智慧、传播的艺术。从提高认识、完善法制、保障资源，到培养人才、活态传承、教育润物，再到创新传播、国际对话，每一个环节都不可或缺。

文化遗产不是束之高阁的古董，而是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生命密码；不是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遗存，而是创新灵感的源泉。在贵州，我看到了文化遗产与当代生活的和谐共生，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美妙对话。

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文化遗产，是对历史的尊重，对未来的承诺。当我们聆听侗族大歌的天籁之音，欣赏苗族刺绣的精妙绝伦，感悟彝族历法的深邃智慧时，我们不仅是在体验一种文化，更是在与人类的集体记忆对话。

让贵州这座“活态博物馆”，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扇窗口，成为人类文明对话的一座桥梁——这既是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实践，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历史与未来的庄重回答。

文化的灯火，将在贵州的群山间永远闪亮，照亮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



丹寨县宁航蜡染非遗工坊，蜡染画娘在绘蜡染画。 黄晓海 摄

27 黑土地 视线

冉正万长篇小说《屯堡》在中国作家杂志首发。（受访者供图）



近日，贵州作家冉正万的长篇小说新作《屯堡》在中国作家杂志首发。这是贵州实施“四大文化工程”进程中涌现的文学创作成果，该小说以明初“南北榜案”为切入点，讲述江南士子郝余良因科举变故西行入黔的故事。

小说采用传统叙事结构，以郝余良的经历为主线，串联起董安贵等众多人物与事件，并通过郝余良的视角，呈现屯堡文化“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的核心价值。

这部16万余字的小说，源于冉正万一次“废稿三万”的顿悟，成于其对贵州多处屯堡的实地寻访。在冉正万看来，写历史小说，终究是要在故纸堆里找到与当代人共鸣的那根弦。

在真实土地上寻找虚构的根基

长篇小说《屯堡》的创作始于2022年，但过程远比预想的曲折。

“《屯堡》的故事背景最初是设定在安顺市云山屯，闭关写了近3万字后去实地，才发现我所构建的叙事根基，与历史现场存在偏差，便将之前所写的内容作废。”冉正万用“疯狂”二字形容那一天的心境，这也让他意识到：历史写作必须脚踏真实的土地。

小说的开头极具戏剧性：信使连夜送捷报，郝余良全家庆祝高中，然后一切突然被取消。“先给读者一个期望，然后毁掉它，再给他新的期望。”冉正万解释道，这也是他常说的文学创作中“开头”的重要性。

冉正万介绍，明朝洪武三十一年（1397），明朝科举出现“南榜中全、北榜落空”的罕见局面，朱元璋下令对此次科举考试进行重新审理。

冉正万有意将主人公郝余良设定为南榜考生中的倒数第三名，“史料对排名靠后者记载甚少，这正好为小说虚构提供了空间”。

这种在历史缝隙中打捞素材的方式，还体现在冉正万对朱元璋之子朱橚的书写上。这位王爷对流放毫无怨言，一心研究植物，编纂出《救荒本草》。这本书收了414种植物，其中276种是首次入药典，每一种都配有工笔插图，详细标注生长地点、食用方法及去毒方式。“这本书传到日本、英国，对后世植物分类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冉正万说。

在小说中，冉正万将朱橚的流放经历与主人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朱橚虽被贬，却没有失意，他走到哪里都继续研究植物，这种精神也影响了郝余良，可以说是两个失意的人抱团取暖。”

冉正万认为，历史小说的写作，要在真实基础上寻找可虚构的部分：既要尊重重大事件的客观性，比如战争、重要人物的生平，又要在细节中注入想象，“像郝余良的生活细节、对话内容、日常饮食，这些都属于可虚构的范畴。”

将文字写在贵州山水间

在贵州的山水间行走，对冉正而言，是创作的源泉，是灵感在大自然里“等”着他。

冉正万出生在贵州省余庆县，18岁离开家乡成为一名地质队员。在野外工作的8年里，他走遍崇山峻岭，亲历贵州最原始的地貌与最质朴的生活。山的挺拔与水的灵动深深影响着他，这些体验也不断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如今的乡村早已改换新颜，但是它的样子已经刻在你的脑海里，写小说时它就会窜入你的脑海，变成笔下的文字。”冉正万说。

冉正万认为，变化寓意着新的生机。生活环境的改变影响着冉正万的题材选择，但他创作的内核始终保持一致：文学创作必须建立在对事物不断了解的基础上。

为了写好小说《屯堡》，冉正万走访了安顺鲍家屯、傅家屯、本寨、云山屯及水城蜂王屯等六七个屯堡。“只有不断行走，才能写出贵州独特的地形地貌。”冉正万笑言，每一次探访都在加深他对屯堡的认识。

“本寨有商业驿站的烟火气息，在傅家屯则能感受到浓浓的军事色彩。”鲍家屯的水利设施给冉正万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入黔始祖鲍福宝将古徽州水利工程建设的方法与鲍家屯地质地貌形态完美结合，形成了如今仍在发挥作用的泄洪抗旱工程。”冉正万介绍道，江南移民来到贵州后，其建筑、习俗与饮食文化，以及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都深深影响了贵州的发展，这些在如今的屯堡中仍能找到印记。

“蜂王屯三面都是悬崖，只有一条斜坡能上去，过去里面曾住过两万人。”冉正万将六盘水市水城区蜂王屯的险峻地势写入小说，让郝余良在“行走”中穿越贵州山水。他认为，这并非简单描写自然风光，而是要展现山水如何与人物命运相互呼应。

事实上，这一创作思路也契合冉正万对屯堡文化吸引大量游客的思考。“旅游的核心竞争力最终源于文化。”冉正万表示，单纯的山水风光容易让游客感到单调，而文化能为自然景观注入灵魂与故事，满足了现代旅游者“求新、求异、求知”的心理需求。

异质化表达与个性化写作

作为在贵州大地上写作了40余年的作家，冉正万见证了本土文学的变迁。

“20世纪90年代，贵州作家几年难见一篇作品上大刊。现在每年都有十多篇，完全不一样了。”他认为，贵州文学的优势在于异质化，“将上海和北京的都市生活写得不同很有难度，但贵州很多生活是别处没有的，可书写的內容十分丰富。”

在冉正万看来，贵州文学的魅力源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多元的民族文化。其作品《银鱼来》以黔北的崇山峻岭为背景，叙述跨越中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故事，真实再现了黔北地区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民情风俗以及社会变迁中人们的命运。

近年来，冉正万持续创作出高质量贵州题材作品。除了《银鱼来》外，还有聚焦抗战记忆的小说集《图云关》、描绘贵阳老街的《洪边门》，其作品中“屯堡石墙、山间银鱼、老街苔痕”等意象，成为当代文坛贵州地域文化的鲜明标识。冉正万说：“贵州给了我最深的滋养，是我最熟悉的土地。”

在冉正万的理念里，人是环境的一部分。“生活在这里，写作的内容也只能源于这里。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自己对生活的感受。”这是冉正万的写作信条。

冉正万认为，贵州的地方史实与整个中国血脉相连。他有个写作习惯：每写到具体年份，必查证当年中国与世界的大事。“或许能发现与贵州的关联，即便没有也很有趣。”

采访尾声，冉正万透露正在创作关于贵州少数民族的新作，尝试“环形结构”叙事。“已经快写完了，但还要改。”语气里既有即将完成的轻松，又有对作品永不满足的苛求。“命运把你抛到哪里，就在哪里扎根。”冉正万这一观点，正如《屯堡》中都余良所秉持的信念。从地质队员到作家，从关注乡村到探寻历史深处，冉正万的身份转变与文学创作紧密相连。他始终在寻找文学与生命的交汇点，那里既有历史的厚重，也有个体命运的回响。